

按资分配是平等,按劳分配是平等,按需分配也是平等。但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平等的尺度却是可变的。因此平等具有历史性、相对性。对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活动主体来说,关键在于选取与该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相符的平等尺度。平均主义只是平等的一个尺度,而不等于平等的全部内涵。在原始社会,选用平均主义这一平等尺度是正确的,但不等于在社会主义时期或其他历史时期都应采用这一尺度。西方经济学的失误恰恰是始终把平均分配作为平等的尺度,而忽略了平等的历史性、辩证性、平等尺度的可变性。本书也接受了这一方法论思想,在笔者看来不能不说这是一种遗憾。作者把用同一尺度衡量,即“形式上的平等”视为公平,而把收入分配的结果均等即“事实上的平等”视为平等,实际上与马克思的原意不符。因为作者理解的结果平等是指人均所得相等,但马克思恰恰指出过,在共产主义按需分配这种事实上平等的社会里,每个人从社会实际获得的消费品是不同的。因为每个人的需要不同,这种“事实上的平等”是以个人需要满足为平等尺度。所以,如果要将公平与平等相区别,是否可以这样说:平等是指用同一尺度去衡量所有被衡量对象,也就是说,平等是指竞赛(游戏)规则相等。而公平则是根据被衡量对象的实际能力,选取不同的衡量尺度,或划定不同的竞赛群体。犹如体育比赛,所有竞赛者均要遵循现行规则(已确定的平等尺度),这是平等的。但要80多岁的老人与20多岁的小伙子一道比赛田径,就是不公平的,将他们分别划入老年组、青年组才是公平的。经济活动也是这样,劳动者遵循按劳分配的要求是平等的,已退休的老人和未成年的孩子就不能遵循这一规则,而应遵循社会保障的规则,这才是公平的。

公平分配之所以是永恒的主题,就在于人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经济环境下,将赋予“公平”以不同的内涵,提出不同的公平(或平等)要求。我国处在经济转型时期,对公平的理解、平等的理解,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角度和结论。《公平分配》一书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即使引发不同看法的争论,本身也是一种贡献。该书作者提出的两个基本结论:微观层次的公平以投入和收入的关联为标准,宏观层次的公平以社会对收入差距的承受力为标准,应当会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循此方向继续探讨和实践,我们将会找到实现公平分配的正确途径和有效措施。

浙江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学院 姚先国

展示活生生的乡镇企业

《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历史与运行机制》,马戎、王汉生、刘世定主编。107.5万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版。责任编辑:沈劭。

乡镇企业在中国的发展起源于农村的手工业与副业传统,在人民公社化时期以社队工业的形式孕育,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得到高速发展,1994年,乡镇企业产值在农村各业总产值中占到70%;1993年,乡镇企业利税总额达2500多亿元,同年国有企业的相应数字为797.55亿元。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成为中国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色。在中国经济体制变革中,乡镇企业是不可忽视的部分;在占人口80%的农村社会变迁中,乡镇企业所扮演的角色更为突出。

80年代中期以来,中外学者对中国乡镇企业从各种角度进行了探讨,关于乡镇企业的著作多种多样(参见《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历史与运行机制》第24—28页,以下简称该书为《乡镇企业》)。

从中国学者对乡镇企业的研究看,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从社区发展角度探讨乡镇企业在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的功能与贡献,如费孝通先生的小城镇研究系列以及他所主持的“江苏小城镇研究”和

“小城镇与新型城乡关系的研究”；另一是对乡镇企业某一方面的讨论，如：张毅关于乡镇企业发展历程、机制与乡镇企业出现的历史必然性的研究，世界银行资助的对乡镇企业所有制、劳动力、运行机制和乡镇企业与社区关系的讨论等。但是，对于一个想全面认识乡镇企业这一事物的人来说，他还需要了解下面的情况：一个乡镇企业到底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某个乡镇企业决定生产某种产品而不是另一种产品，他们如何获得启动资金，如何雇用助手和工人，如何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问题，如何获得原材料，如何开拓自己的产品市场，乡镇企业与乡镇政府之间关系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影响某个乡镇企业发展壮大的因素主要有哪些，乡镇企业经营者如何管理企业等等。而这样的问题是既有研究成果所无法回答的。《乡镇企业》一书在很大程度上回答了上述问题。该书最大的特色是运用个案研究的方法，把一个个乡镇企业活生生地展示到读者面前（全书95%的篇幅是32家乡镇企业的个案）。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乡镇企业》隐含了关于中国社会研究的方法取向。

如何认识中国社会是一个从本世纪20年代社会学与人类学传入中国以来就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如果对这种争论进行简单的概括，似乎可以归结为两个最基本的问题：第一，从何处入手？第二，用何种方法？争论焦点是对这两个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宏观与微观；定性与定量。

二次大战以前，国外社会学界主张定量或定性的两大学派各持己见、争辩不断。大战以后，一方面各种以问卷为资料收集方式的调查研究使定量方法取得了明显的优势；另一方面，安乐椅上的社会学家们从概念到命题不断地推出他们关于社会的认识，使宏观社会研究在学术界占了上风。60年代以后，由于定量研究与宏观理论在解释人类社会行为与具体社会事实上的苍白无力，定性与个案方法越来越获得了学界的认同并且发展迅速（参见Karl M. van Meter《社会学方法论》，《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2-1，1995年）。其实，在定性与定量、宏观与微观的方法取向上并没有所谓的孰是孰非问题，应该说不同的问题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方法，在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的国度里尤其如此。

从30年代开始，费孝通先生就把人类学个案研究的方法引入到中国社会研究之中，他的《江村经济》首先是人类学方法的一大突破，因为在他之前，人类学一直是一门研究落后的他民族的学问；同时也为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提供了一个适用的方法框架，因为在他之前，中国社会研究虽有杨开道教授及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生的清河调查以及李景汉先生的定县调查，但是这些调查并没有把个案与其社区所在的背景联系起来。费孝通先生由此形成了他自己的社区研究方法：从一个一个的乡村调查开始，逐步到一个一个乡镇，近而过渡到对中国社会整体认识的接近。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费的社区研究首先承认了中国社会的多样性，他并不认为“江村”可以代表中国农村社会的整体。他认为，要想接近（而不是完成）对中国社会整体的理解，就要去寻找不同的类型（模式）并一个一个地去认识，进而求得认识的一般化或者求得中国社会的共性。换言之，费的社区研究在承认多样性的基础上也明确了对类型之间共性的认同。这种研究方法在认识中国社会进而推动中国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费孝通《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

由费孝通先生创建的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很自然地继承了这一方法传统。《乡镇企业》正是体现了这一传统的影响，它比较成功地把握了个案研究和费的社区方法的特点，一方面利用个案方法的特点细致深入地了解乡镇企业管理的细节材料和企业经营方面的详尽数字、企业发展过程中的生动经历与种种曲折，同时又结合费的社区方法的长处，把乡镇企业放在中国改革发展的宏观背景下去搜寻乡镇企业生长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企业内部机制与外部环境的互动。这就是说，乡镇企业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它的举手投足不仅与经济因素如资金、技术、劳动力、购销、管理

有关,更涉及各种人文与制度环境。弄清楚这些问题,乡镇企业才不会只是统计图表上的一组数字或一条曲线,才能体现乡镇企业实际运作的情况,即把乡镇企业作为人、团体、政府与制度互动的产物。

准确地说,《乡镇企业》是一部个案报告集,32个个案报告记录了32家不同类型的乡镇(集体)企业历程与运行机制。每一个报告的篇章结构相似,包括:乡镇企业所在镇或社区的基本情况介绍,企业的发展史,经营机制,资产存量,生产过程,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人员构成和用工制度,报酬和福利,劳动纪律,基本财务核算,资金来源,与镇财政关系等。此外,在每一个个案报告的后面还有详细的附录,包括与企业经营活动有关的各种往来文件,承包合同,各种规章制度,财务报表等最原始的资料。这样的结构等于把同一事物所涉及各个方面同等程度地进行了解剖,各个乡镇企业的异与同就完全体现在不言之中了。总起来看,《乡镇企业》提供给读者的是一个真实的、活动着的、能给人以想象的乡镇企业。而且,该书还注重了经营者与企业、乡镇企业与地方社区、同一社区中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乡镇企业领导人的个人背景对乡镇企业的影响等社会学层面所特有的一些问题。为读者中性地展示了一个个乡镇企业的存在与活动,其学术价值是不言自明的。

然而,沉醉于玩味个案而不思总结就有如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在一定的意义上也有失个案研究方法的宗旨。费孝通先生曾经总结了的社会研究的六字技巧:“进得去、出得来”(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东亚社会研究》第16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所谓“进得去”是说研究者要深入到自己所研究的对象中去,从对象的角度去获得对研究对象的理解。但研究的目的是要在获得理解基础上跳出来去求得一种认识,这是他所谓的“出得来”。从这个意义上看,《乡镇企业》的作者们如果能够在个案描述的基础上跳出来有所总结或比较,说出作者对中国乡镇企业的一家之言,那么,该书对社会学本土化建设的贡献就会更大了。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邱泽奇

经学研究的可贵成果

《廖平评传》,黄开国著。26万字。

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11月出版。

当代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家冯友兰先生曾多次指出,中国经学开始于董仲舒,终结于近代经学大师廖平。透过对廖平经学的剖析,揭示经学在中国近代终结的历史必然性,是廖平研究,也是近代经学研究的重要课题。黄开国同志致力于此,孜孜矻矻,积十年不懈的研究,先后在《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研究》、《孔子研究》和《孔孟学报》(台)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二十余篇专题论文,并在此基础上,于最近推出了代表目前海内外廖平研究最新水平的学术专著——《廖平评传》。

作者充分占有了关于廖平学术的第一手资料,用简洁的语言、深入的论证和缜密的逻辑分析,对廖平经学作出了富有独到见解的研究。

对廖氏经学六变的总体深刻把握,是本书首先应提及的成果。廖平经学前后发生了六次大的变化。就研究的程序而论,应先有各变的研究,然后才能有综合六变的总体认识。然而,就研究的深入而言,唯有上升到对六变的总体把握,才可能将各变作为有机的组成部分,作真正的深入研究。否则,